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自反性” 或“反思性”现代化

谢立中

从1990年到1992年,吉登斯、拉什和贝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分别提出或使用了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这个概念,从而使这个概念逐渐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997年,这三位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又联袂写作了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一书,试图对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这一主题进行更集中、更系统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们共同认为,尽管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了,但如此喋喋不休、永无止境的争论不但使人厌倦并且于事无补,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的概念和思想将打破这类争论对于概念创新的束缚,从而为人们理解和分析西方社会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提供一个更为贴切的概念框架。本文拟以这本书中由贝克、吉登斯、拉什三人各自撰写的一篇长文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批评式和建设式的讨论文章为依据,对他们三人有关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的思想分别予以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一、贝克:作为“自反性现代化”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在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一书中,虽然三位作者都使用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这个词组来概括自己所阐述的理论观点,但实际上他们各自对这一词组的理解却有很大不同。



按照贝克自己的说法,“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e: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这篇文章是对其著作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一书主要论点的简要介绍。在这篇文章以及回应性文章《何谓工业社会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威胁》(“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中,贝克重申了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是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的观点。表面上看,这与吉登斯和拉什著作中的相应提法是类似的,但实际上,贝克对此一提法中 reflexive 一词的含义有着自己的特定理解。在英文中, reflexive 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反思的、内省的”,二是指“反身的、自反的”。贝克主要是从后一种含义来理解和使用 reflexive 一词的。贝克反复强调他是在“reflexivity”(自反性)而不是在“reflection”(反思性)的意义上使用 reflexive 一词的。贝克明确地说: reflexive“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反思性,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①。“我所说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 reflexive 并不是指对现代性的反思、自我相关性和现代性的自我指涉性,也不是指经典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自我辩护或自我批评;相反(首先),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见的,因此没有反思。”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是指“创造性地”毁灭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毁灭”的对象并不是西方现代化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贝克指出,他提出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理论上是一种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理论”(the reflection theory of modernity)不同的“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reflexivity theory of modernity)。所谓“现代性的反思性理论”可以简化为这样的观点:“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主体)就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进行反思和加以变革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可以大致地简化如下: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

①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e: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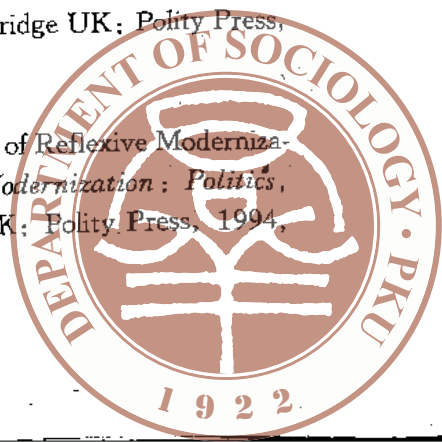
消费、改变和威胁。使这种对照得以成立的事实是：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①贝克认为，“现代性的反思性理论”和“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还有以下两个区别。首先，“自反性理论（在特定情况下）包含着现代化的反思性理论，但反之则不然。认知理论意义上的反思性现代化忽视了（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这样的可能性，即向现代性的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可以在无意中、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发生，绕过工业社会（包括它的各种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辩）的主导范畴和理论。”其次，“自反性现代化的认知理论的核心是乐观主义的——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专家、更多的科学、更多的公众领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中为行动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并没有分享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分享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倡导的那种相反的观点。在这方面，我所提出的理论是中性的，也更加复杂，它接受和采纳了鲍曼关于‘现代性的矛盾情感’的思想，其论点是：现代性的自反性能导致对工业社会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的反思，但却勿需如此。”^②

贝克把现代化分为“简单（或传统）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两种，前者被他解释为“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进行抽离、然后再重新嵌入”；而后者被他解释为“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接着再重新嵌入”^③。通过“自反性现代化”这个概念，贝克试图反复强调现代社会从“简单现代化”阶段进入到“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自发性。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本身就包含着不断自我消解、自我创新，将自己从一种形态演变为另一种形态的内在动力。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76.

② Ibid., p. 177.

③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e;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2.



“凭借其内在活力,现代社会正在暗中削弱其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的结构,当然也削弱着其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持续形式。这个新阶段——其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就是我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①

贝克指出,“工业社会的活力削弱其自身基础”的说法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说法之间表面上看极其类似,但实际上其含义完全不同。首先,在这里,创造新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由此导致的新社会格局与“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一场工业社会的变迁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悄悄而来,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秩序却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迁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轮廓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②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变迁首先意味着社会剧变的分崩离析和痛苦的过程。但贝克认为新社会并不总是诞生于痛苦之中,“日益增长的贫困、不断增加的财富以及东方对手的消失都使问题的类型、关联范围和政治品质发生了一种轴心化的变化。各种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猛的技术发明以及高度的就业保障能够发动一场将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一个新时代的风暴”。妇女走出家庭更多的是参加工作、工薪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契约的弹性化、工作与非工作之间旧界限的消失……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人都熟悉的、适度而不激烈的变化掩盖了社会变迁的范围和程度,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就这样悄悄地发生了。但尽管如此,贝克指出,“作为一种规模广阔、结

^①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2.

^② *Ibid.*, p.3.



合松散且结构不断变化的现代化过程,自反性现代化不能仅仅被当作一种‘新的造物’而为人们像慈善家似的好奇。从政治上说,这种现代化之现代化也是一种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主要现象。”^①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反性现代化都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类型,因此必须采用一些有别于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和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

在《何谓工业社会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威胁》一文中,贝克简要概括了“简单现代化”与“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别:

第一,在简单现代化时代,不平等发生在大型群体和阶级之间,在自反性现代化时代,不平等则发生在个体之间;

第二,在简单现代化时代,主要问题是具有自主性的各个行动领域之间的分化问题,在自反性现代化时代,这一问题则被相互分化的亚系统之间的功能性协调、网络和聚合的问题所取代;

第三,在简单现代化时代,发展起来的是对线性进步观和社会控制的信仰,而在自反性现代化时代,这种信仰则被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的观念所取代;

第四,简单现代化时代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存在于工具理性之中,自反性现代化的原动力则存在于行动的各种副作用之中;

第五,在简单现代化时代,人们普遍接受“左”和“右”的政治立场划分,而在自反性现代化时代,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理论冲突正在超越“左”和“右”的划分。^②

在对“自反性现代化”所做的进一步的讨论中,贝克引入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把“工业社会”与“简单现代化”相对应,而把“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相对应,认为“风险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继工

①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4.

②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p. 182—183.



业社会之后的新发展阶段。他写道:“那些把现代化过程想像成一个自主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期望即使是工业社会也会过时。工业社会成为过时之物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离工业社会中的各种监督与保护制度。”^①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这种“自信”被贝克描绘成为“关于进步的共识或生态影响及危险的抽象化”。风险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它不是政治争论中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负面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性中。这些负面的影响和威胁在暗中积累,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现代性从工业阶段到风险阶段的过渡是未曾期望的、未被察觉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态过程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②

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这种冲突与现代化自我反思意义上的知识和科学化的增加是不同的。所谓“自反性现代化”中的“自反性”一词,指的正是这种“未曾期望的、未被察觉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自主性转化过程”。^③“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导致风险社会各种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以其自身的制度化标准来衡量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在现代社会的这个阶段中,工业化社会的道路上所产生的各种威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围绕着各种‘好处’(收入、工作、社会保障)而展开的分配性冲突——这是古典工业社会的基本冲突并在相关制度内引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各种企图——被围绕着各种‘坏处’而展开的分配性冲突遮没了。这些冲突可以理解为责任分配方面的冲突。它们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5.

② Ibid.

③ Ibid., p. 6.



围绕着如何分配、预防、控制和合法化好处生产过程中所伴随的各种风险(核技术、化工技术、基因研究、对环境的威胁、过度军事化以及西方工业社会之外的日益贫困化)而爆发出来”。^①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任务,如“发展的自我限制问题以及就迄今为止出于对各种潜在威胁的注意而获得的(责任、安全、监督、灾害控制以及灾害后果的分配方面的)标准进行重新制定的任务”等。^②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至少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的转变。

第一,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非人类的自然界、一般的人类文化以及核心家庭、性别秩序一类的专门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劳动资源等)的存在是工业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但在充分确立之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资源逐渐消散了。

第二,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之理解范围的那些“威胁和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它们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的根本假设。

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集体的或具体某个团体的意义之源(如阶级意识或对进步的信念等)正在枯竭、解体和脱魅,这导致了新的“个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被从工业社会中释放到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湍流中”;个人开始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成为权利和义务的对象;“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和矛盾等先前能够在家庭和村社中或通过求助于社会阶级或团体而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③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回归”。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总是在制造着风险。但在早期现代性时期,风险本质上还是可计算和可控制的,人们也最终设计了种种制度来预测和控制风险,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6.

② Ibid.

③ Ibid., p. 8.



使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这使得早期现代社会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秩序井然的。然而,在“风险社会”中,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重新归来并四处扩散。”^①作为工业社会自身内在逻辑的副作用,现代性创造出了许多难以预测、难以计算也难以控制的新型风险。这些风险总是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仅此而已,但又不排除任何事物的发生:一种危险发生的概率可能接近于零,但也可能随时发生。这些风险具有无限可再生性,它总是随着我们制定的每项决策和观点自我繁衍。面对这些风险问题,既可以说任何人都不是专家,又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视野也往往随着这些现代性风险的增长而模糊,因为这些风险只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风险社会时期风险尤其可怕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旧有的那些概念、决策程序和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失去它们以往曾经有过的效力。工业社会、市民社会秩序、尤其是福利国家和保险国家本来都是设计用来使人类的生活情境变得可以为工具理性所控制以及可制造、可获取和可说明。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控制的副作用反过来却引发了原以为已经克服了的各各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措施,而且伦理的、法律的原则和范畴——如责任、内疚和(追查损害时)污染者偿付代价的原则,乃至一些政治决策程序(如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不适于用来理解与合法化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这种回归。与此类似,面对着大量必须得到呈现和理解的矛盾事实,社会科学的各种范畴和方法也失灵了。”^②因此,必须为决策、效力关系以及对这些不可预测和不可负责的后果进行批评并重新确立规则和基础。这就使得风险社会必然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倾向的社会。人们必然要围绕着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这些新制造出来的不可计算性与失序能否继续沿用工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2.

② *Ibid.*, p. 10.



具理性的控制模式,通过求助于工业社会的老一套——更多的技术、市场、政府等等来加以处置呢,还是需要从此开启一种将会接受和确认这类矛盾并将为社会行动的所有领域带来深远影响的新思路和新的行动方法呢?)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风险社会也因此将为社会批判提供新的根基,开辟新的领域。

不过,在风险社会中,政治景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社会的政治将在某种程度上为风险社会的亚政治所取代。这种取代与风险社会中社会的“个体化”过程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工业社会依然是一个“集体化”社会,因为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是以家庭、阶级等形式的“集体”为单位的,成功和失败的后果都是由集体来承担的,个人只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存在。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现代化过程则带来了社会的“个体化”。“‘个体化’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和再嵌入,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筹划和修补自己的社会经历。”^①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将成为权利和责任、决策和风险承担的主体。个体化过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只能发生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后果而出现。因为福利国家制度“假定个人是其自己个人生活、身份、社会关系网、承诺和信念的演员、设计师、魔术师和导演。”^②它“善意地号召个人把自身构筑为一个个体,号召个人进行计划、理解、设计和行动——或者在失败的情况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③社会的这种个体化并不总是私人性的。“它在一种明确的新意义上具有政治性:作为其自身和所处世界的拙劣修补匠,个性化的个人已经不再是功能主义所假定的简单的古典工业社会中的‘角色扮演者’”。^④个体既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也就将成为风险社会中各种政治活动的主体。风险社会中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分散的、自发的、无组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3.

② *Ibid.*, p. 14.

③ *Ibid.*, p. 16.

④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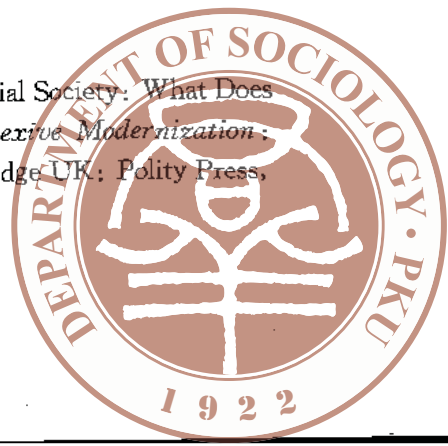
织的个体而不是由议会、政党、工会等传统的政治行动主体来发动和承担;政治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工业社会的那些传统主题:“工业社会的政治正在变为非政治性的,而在工业主义中属于非政治性的东西则正在变为政治性的。”“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一直受到政治保护的那些决策领域——私营部门、商业、科学、小城镇、日常生活等——在自反性现代性中都被卷入了政治冲突的风暴中。”^①一句话,工业社会的政治正在为风险社会的“亚政治”所取代。在风险社会的亚政治中,工业社会的那些政治标签(左派和右派、保守的和社会主义的、退却和参与等)也失去了它们的效力。“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在同一时间内都是既左倾又右倾,既激进又保守,既民主又不民主,既主张生态主义又反对生态主义,既政治化又非政治化。每一个自我从某些方面来说都既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消极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②

贝克指出,与工业社会主要受到来自上面的机构和制度的形塑不同,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来形塑社会。“从上方看下来,这导致了贯彻能力的丧失以及政治的收缩和被轻视。作为亚政治化的后果,从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社会安排中取得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团体包括公民、公众领域、社会运动、专家团体、在岗工人;那些勇敢的个人甚至有机会在发达的神经中枢‘移动大山’。因此,政治化意味着中央统治方法的衰弱,意味着迄今为止顺利运转的那些过程在各种相互矛盾的目标的抵制下以失败而告终。”这虽然焕发了普通社会成员的政治活力,但也有可能导致社会运行过程的普遍“瘫痪”。^③因此,在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现代性中,我们有必要再造一种与新的社会情境相适应的新政治。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8.

② Ibid., p. 21.

③ Ibid., p. 23.



“再造政治”的过程是一种“政治的政治”。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政治的政治”，贝克在“政治”和“亚政治”这对概念之外，又提出了“简单政治”或“受规则指引的政治”(rule-directed)与“自反性政治”或“改变规则的政治”(rule-altering)之间的区分。前一种政治“当然可以有创造性，可以违反规则，但它运作于民族国家中的工业和福利社会国家的规则系统之中。”而后者“则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政治的政治’为目标”，是一种“元政治”或“超级政治”(meta-politics, or super-politics)。这种元政治或超级政治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规则系统的转换，二是转换到什么规则系统。无论是“简单(受规则指引的)政治”还是“自反性(改变规则的)政治”都可以包括“政治”和“亚政治”两个领域。贝克指出，在当前的欧洲，人们所面临的正是“简单政治”和“自反性政治”这两种政治形态的混合。一方面，“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左和右之间的对立、团体与政党利益之间的冲突，古典工业社会中的这些游戏还在继续。与此同时，许多人要求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把规则系统翻转过来，尽管——打个比方说——人们对于将来玩的游戏会是桥牌、掷骰子还是足球依然不清楚。受规则指引的政治和改变规则的政治相互重叠、相互混合并相互干扰。有时其中一方居支配地位，有时则是另一方居支配地位。”^①贝克对那些坚持用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形式(机构和规则)来解决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问题的做法深表怀疑。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和激进化，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规则系统内的“简单政治”无论如何也是承担不了正在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和问题的。“一个人只要不想对此视而不见，那么他就必须从自己的目标——政治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中将现存的政治框架丢开或者至少对它们加以开放、扩展、重新思考和重新构造。”^②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进行大量新的政治创新，包括对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结构进行改革，超越“左倾”和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36.

^② *Ibid.*, pp. 37—38.



“右倾”的政治范畴、围绕新的政治主题创造出新的政治秩序,以及打破传统的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之间的界限,建立新的政治领域等等。“政治的发明意味着有创造力和自我创造力的政治,这种政治既不培育和恢复旧有的敌意,也不从中汲取其权力和强化其手段,而是设计并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和新联盟。这就意味着一场政治复兴”。^①自反性现代性或风险社会所急切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政治复兴。

二、吉登斯:作为“后传统社会”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安东尼·吉登斯的《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的景象。与贝克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反思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reflexive”一词的。吉登斯曾经用“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激进的现代性”等词来描述西方社会当前所处的社会状态。“高度现代性”或“激进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反思性。因此,“高度现代性”或“激进现代性”同时也就是“反思性现代性”。而在“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一文中,吉登斯又将“高度现代性”、“激进现代性”、“反思性现代化”与所谓“后传统社会”联结起来,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同时也是“后传统社会”,并从“后传统社会”的角度对“反思性现代化”进行了简略地描述和讨论。

什么是“后传统社会”?简单地讲,所谓“后传统社会”就是“传统”不再起作用或“传统”已经终结了的社会。不过,吉登斯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更具体地说明什么是“传统”和“传统社会”：“若要理解生活在后传统秩序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考

^① Ulrich Beck, *Self-dissolution and Self-endanger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What Does This Mea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38.



考虑两个问题：传统实际上是什么？‘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是什么？”^①人类学家通常把“传统”与“重复性”相联系，并将其视为社会的粘合剂。吉登斯认为对“传统”的这种理解不能把握住其真正的要点。“重复性”特征是个本身需要加以解释的东西，“重复”与社会的凝聚力之间也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吉登斯说他所理解的“传统”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 传统是一种集体记忆，它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地被重建。“这种重建过程部分地是个体性的，但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是社会的、集体的”；“我们不断地再生产出关于过去事件或状态的记忆；这类重复赋予经验以连续性”；“传统的‘完整’不是源于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而是源于不断的阐释工作，这种阐释的目的在于确认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纽带”^②。

2. 传统往往牵涉到仪式，或者说，传统包含仪式。“对赋予传统以完整性的社会框架来说，仪式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是确保存续的实用手段。”“仪式把对过去的不断重构与实践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具有真实可见性。”^③传统总是通过仪式来得到保存和重建。

3. 传统与吉登斯所谓的“真理的程式概念”相联系。传统包含着“程式真理”，或者说，在传统社会中，“真理”具有程式性。“程式真理”与现代社会中的“命题真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程式真理中的语言是表述性的，是一种仪式化的语言，命题真理中的语言则是指涉性的；程式真理的有效性依赖于仪式的因果效验，命题真理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其表述的内容与有关事实相符合；等等。

4. 传统的“守护者”。传统的守护者包括长者、土医、魔术师及宗教人员等，他们的使命是解释、维护和传授传统。“他们被认为是因果力量的代理人或实质性的中介人。他们是奥秘的捐客”。^④这些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62.

② Ibid., pp. 63—64.

③ Ibid., p. 64.

④ Ibid., p. 65.



传统的守护者很像现代社会中的专家,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守护者不是专家;守护者所拥有的神秘知识大多无法与圈外人交流;守护者的主要特征是其传统秩序中的地位而不是其“能力”等。而专家则相反。例如,“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在外行眼中可能是神秘的,但任何人原则上都可能取得这种知识和这些技能,只要他打算这样做。”^①

5. 所有传统都具有规范的或道德的内容,从而使传统带有约束性特征。传统的这种道德性为坚持传统者提供了一定的本体性安全。

所谓传统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传统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传统无所不在。“所有的前现代文明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统。”^②“即使最先进的前现代文明也依然是绝对传统的。”^③只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传统才逐渐地遭到挑战和破坏,逐渐地退出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可以说“现代性摧毁传统。”^④当然,这样说过于简单化。有必要对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做更具体的说明。

吉登斯指出,虽然现代性和传统最终是要分裂的,但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合作对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还是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前现代文明中,存在着政治中心和地方社区之间的二元分裂,政治中心的活动从未完全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人口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地方性的农耕社区中,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土豆”。这种状况也体现在“传统”的结构上面,形成了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二元分裂。前现代文明的社会结构特征决定着大传统“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传送到地方社区中”,大传统对地方社区的控制也是不可靠的。传统内容中的很大部分属于地方层次上的小传统。这些小传统虽然受到大传统的影响,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65.

② Ibid., p. 66.

③ Ibid., pp. 91—92.

④ Ibid., p. 91.



但毕竟与后者有着较大的区别。随着社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作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联袂发展的结果,新的监控机制逐步建立起来。新的监控机制可以保证更大程度上的横跨时空的社会整合,从而使政治中心对地方社区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然而,吉登斯指出,“在早期的现代国家中,监控过程仍然利用着传统的合法性资源,例如君主及其家族的神授统治权。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在此处的分析来说尤其如此)早期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仍然假定了地方社区的分裂性……早期的现代制度不仅依靠早已存在的传统而且还不创造新的传统。程式真理以及相关的仪式被强行运用到新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国家这个象征性的领域。”^①吉登斯认为,早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方面:

第一,各种新老传统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仍然占有中心地位。

第二,人们一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科学的合法角色使得与程式真理紧密相连的真理概念得以永存。“科学与宗教”的斗争掩盖了科学权威的矛盾性质,也使得许多专家实际上成为守护者。

第三,传统虽然正在逐渐地演变成为“强迫性”,但现代性的强迫性本质并不是彻底隐蔽的,也并非未受抵制。

第四,现代性的强迫性一开始便有性别的分野,主要属于男性领域。

第五,传统仍然被用于个人和集体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例如,工人阶级邻里之间的‘社区感’就部分地采取了传统重构的方式,国家层面上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②

吉登斯认为,“只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及民主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普遍化,地方社区才在实际上开始解体。在此之前,监控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它们是用来对尚未被动员起来的松散‘臣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p. 92—93.

^② *Ibid.*, p. 95.



民'进行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的手段。因此,民族国家的加速发展时期也便是普通大众被更紧密地纳入横跨地方社区的整合系统时期。”^①随着现代化过程的进一步展开,现代社会便进入了所谓的“反思性现代化”时期。在反思性现代化时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反思性现代性中,“制度化的反思性成为传统的主要敌人;行动的地方性情境的撤离与日益增长的时空抽离相伴而来。”^②“以全球化和最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这一双重过程为标志的‘反思性现代化’阶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③随着传统从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逐渐撤离,我们便进入了“后传统社会”。

随着“后传统社会”的到来,我们的生活也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第一,“强迫性”(compulsiveness)或者“成瘾”(addiction)逐渐取代传统而成为我们行为的主要动机。在前现代社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行动和自我认同的是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传统。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传统逐渐消解,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行动和自我认同的不再是传统而是所谓的“强迫性”。所谓强迫性,指的是对于不断重复某种行为的“情感性压力”(emotional drive to repetition)。“对于这种压力,当事者要么几无意识,要么知之甚少。过去不断延续,但它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被积极地重构,而是倾向于以准因果的方式主导着行动。”^④“强迫症”这个词也可换成“成瘾”这个词。“我们感觉不得不撒谎以掩盖的任何东西都是瘾”;“瘾就是一种失去了与传统‘真理’之间的联系的重复;虽然当事人可能对他人撒谎,但他或她并不清楚其根源。”^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借助于传统来使自己的行动例行化,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主要依靠“成瘾”。随着社会进入到“后传统”阶段,“强迫性”或“成瘾”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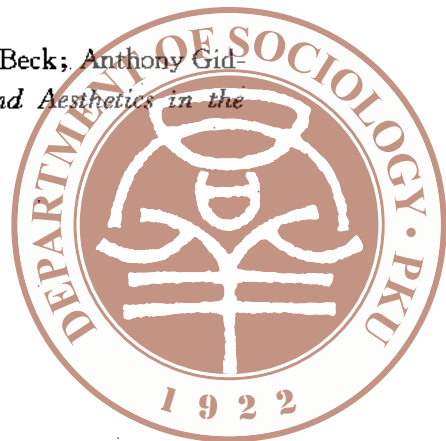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93.

② Ibid.

③ Ibid., p. 95.

④ Ibid., p. 70.

⑤ Ibid., p. 71.



特征。“人们在今天重复昨天的行为并没有逻辑和道德的确实性,而这正是传统的本质。今天我们可能对任何东西(生活风格的任何方面)成瘾,这一事实表明了传统消解的广泛性。成瘾的发展是后现代社会世界的一个有实质性意义的特征,但同时它也是社会去传统化过程的一个‘负指数’。”^①

第二,“选择”日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义务。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由传统所决定。而在“后传统社会”中,我们却不得不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进行“自主选择”。“在后现代情景中,我们不得不对如何生存和如何行动加以选择。”^②由于以往支配着人们行动的那些传统逐渐消失,“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事实上变成是可以选择的,或者说,选择已经成为义务。”^③当然,那些以为在“后传统社会”中人们将拥有绝对自主性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即使在“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受到无意识、习惯和权力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第三,与“传统”的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纯“自然”的逐渐消失,是“自然”的逐渐社会化、人工化以及被破坏。“自然”和“传统”之间既存在着外在的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从外在方面看,“自然”与“传统”非常相似,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处于人类干预范围之外的东西。从内在方面说,“传统”往往具有保守性,“传统为行动规定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程式真理,与仪式的稳定性影响一道,使无限的可能性成为‘死球’”;^④“在许多传统中,自然被人格化了;它是诸神、精灵和恶魔的领地”。^⑤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然”免受人类行动的较大干预和破坏。然而,随着传统的逐渐消失,原始的自然也在逐渐地消失,逐渐地变得越来越社会化、人工化。从农业的兴起、特别是几大文明以降,人类历史就开始是自然环境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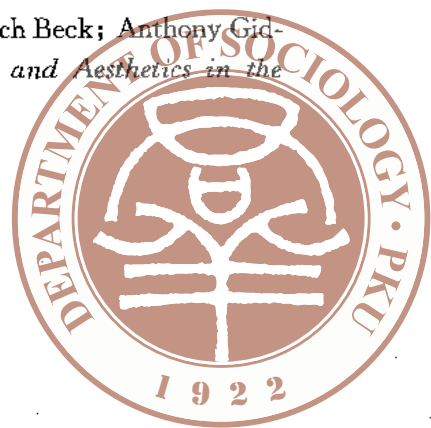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71.

② *Ibid.*, p. 75.

③ *Ibid.*, pp. 75—76.

④ *Ibid.*, p. 76.

⑤ *Ibid.*, p. 77.



毁坏的历史。但直到现代来临之前,自然大抵还是一个支配人类活动的外部系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自然”这个概念日益被“环境”这个概念所取代。实际上,所谓“环境”即是在人类的干预下彻底变形的自然。“只有当自然像传统一样已被消解之时我们才开始谈论‘环境’。”^①只有在今天,在这个“后传统社会”中,“我们可以在一种真正意义上说自然已经终结了——这是指自然被彻底社会化。”^②“当今自然的社会化意味着以往多种多样的自然系统现在已是人类决策的产物。”^③例如,地球的气候就已不再是自然赋予的秩序。面对着这种情境,有人试图通过探索新的世界观乃至某些传统的复兴来扭转事情发展的态势,但吉登斯认为,“这一选择过程并不是传统的重新觉醒,而是某种新的东西。他把接受传统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任何使自然复活的企图都不可能将自然带回到它过去曾经所处的那种状态中”^④。

第四,“权威”日益从“传统的守护者”手中转移到拥有“专门知识”的各种“专家”手中。韦伯在讨论“权威”时曾经区分了“传统型权威”和“现代型权威”,并将前者归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将后者归于现代官僚体制中的官员。吉登斯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权威属于守护者的领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拥有特别的途径来接近程式真理的因果力量”;“无论个人的忠诚能够产生出何种程度的信任,传统领导权的稳定性更多地依赖于能获得使这种必要的‘光环’永存的符号。……传统的守护者们的影响一旦消失殆尽,头人或王子的权力便会很快化为乌有。”^⑤而到了现代社会中,权威则转移到拥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专家”手中。“专家”不等于某种专门的职业人士。“专家是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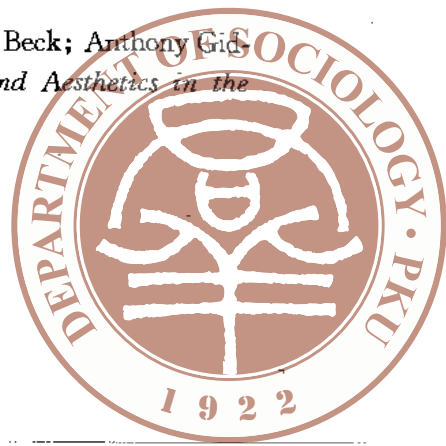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77.

② Ibid.

③ Ibid., p. 78.

④ Ibid., pp. 78—79.

⑤ Ibid., p. 83.



一个能够成功占有某些特殊技能或外行所不具备的知识类型的人。”^①“专家”和“外行”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某个具体领域中拥有较多专门知识的人相对而言就是“专家”，反之就是“外行”。二者在技能和信息占有方面的失衡使前者在后者面前成为“权威”。“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所有行家都是专家。”^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也只是广义上的专家之一。各个领域的专家们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专家系统”。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之后果》等书中所指出过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专家系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早期现代性中，由于传统还没有完全撤离，“传统的守护者”在日常生活中还起一定的作用；随着“高度”或“反思”现代性的来临，传统从社会生活中大幅撤离，专家系统便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因素。

第五，终极权威的消失、日常生活和信任机制的不稳定性。权威从传统守护者手中向专家手中的转移是以指导社会生活的知识类型的嬗变为基础的，是与传统“智慧”在生活中的作用为现代的科学知识所取代这一过程相平行的。与传统智慧相比，现代的专门知识有着许多特点，如：专门知识是高度普遍或抽离性的，从根本上说是非本地的、无中心的（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本地知识”都变成了来源于别处的知识在本地的复合物，或者说是来自某种抽象系统的再嵌入信息）；专门知识所依靠的不是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的信念；专家的知识积累包含着内在的专业化过程；专门知识与日益发展的制度自反性相互影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和知识不断损耗并被重新配置；等等。但现代专业知识最重要的特征则是贯穿于其中的基本原则：包括现代科学知识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得面临怀疑。这一特征使得现代科学知识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易变性，也使得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基础上的专家权威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非终极性。但在早期现代性时期，由于人们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特殊理解、人们尚未对西方的主导地位提出异议，以及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等原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84.

② *Ibid.*, p. 88.



因,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现代科学知识和专家权威的这种不确定性、非终极性。“至少在公众眼里,科学与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仍然是普遍意义上的‘权威’坚定的源头。守护者与专家的区别也就不那么明显了。”^①“科学”依然像“传统”一样具有终极上诉法庭的权威。然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渐深入,科学知识的内在不确定性逐渐显露出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了科学知识、专家权威以及依赖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整个现代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多变性。在“后传统社会”中,科学已经失去了很多它曾经拥有的权威的光环。“所有一切原则上都必须被看做是可以质疑的;在知识的‘流动’领域中,任何时候都能够发现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对抗的理论主张和实践主张。”^②这种情形决定性地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专家和外行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人们对专家的这种信任原则上也是可以修正、随时加以撤回的。这使得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本质上也具有了内在的不稳定性。“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整个制度设置一旦脱离了传统就必须依赖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③信任危机乃是后传统社会中经常存在的可能性。

第六,后传统社会还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不像启蒙思想家们乐观地想像的那样把我们的社会生活不断引向理想的方向,也不像韦伯悲观地想像的那样把我们带进技术知识的“铁笼”。高度现代性要比这两种想像都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偶然性。在这个世界上,机遇和危险平分秋色。危险来自于我们在开拓未来的行动中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这些危险还是可计算与可控制的。然而,到了高度现代性阶段,许多危险便成为不可计算和难以控制的了(如全球变暖等)。在后传统社会中,“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已带有实验性。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全都卷进了一场宏大的实验中;这场实验既由作为人类主体的我们来进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87.

② *Ibid.*, p. 88.

③ *Ibid.*, p. 90.



行,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这不是那种实验室意义上的实验,因为我们不能把实验结果固定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它更像是一次我们无论是否乐意都得参加的冒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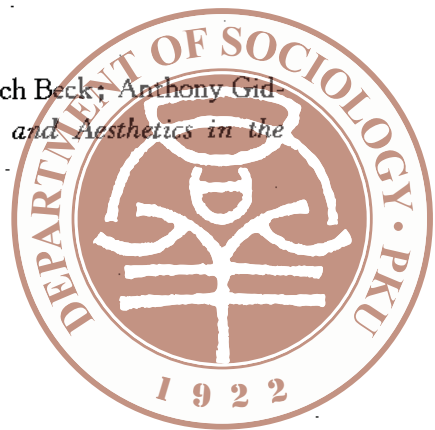
第七,社会生活日益全球化,正在逐渐形成所谓的“全球社会”。现代化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或趋势,“一方面,现代制度持续性扩张,通过全球化实现普遍化;另一方面,与前者紧接相随而来的是各种内部的变迁过程,这些变迁过程可称之为现代性的激进化。这些内部的变迁过程即是传统的撤离过程,是对传统的挖掘和质疑。”^②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关联的:现代性越变得全球化、普遍化,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就消失的越快、越彻底,日常生活就变得越去传统化和越激进化。在“后传统社会”中,全球化以及地方传统的撤离都已经进入到高级阶段,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社会”。“后传统社会是第一个全球社会。直到相对较近的年代,世界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准分裂状态,持续存在着许多传统主义的飞地。在这些地区乃至一些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地方社区仍然很强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即时全球电子通讯技术发展的影响下,这些情况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③“在今天的发达社会里,对地方社区的破坏已达极至。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幸存下来或被创造出来的小传统日益屈从于文化撤离的那些力量。在某些前现代文明中曾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如今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④地方生活日益受到外部影响的重塑,残存下来的地方风俗也往往会改变含义,变成遗风或习惯,甚至退化为“活的博物馆”;与大小传统相关的物品往往变成遗物;集体仪式也渐渐从与传统的程式真理紧密相连的“仪式主义”活动演变成成为社会交往的“仪式化”活动;等等。面对现代性的强大挑战,传统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59.

② Ibid., p. 57.

③ Ibid., p. 96.

④ Ibid., p. 101.



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要么通过与现代性对话的形式来为自己进行辩护,为自己的继续存在提供理由或证明,要么就只有与现代性暴力相向。

概言之,吉登斯总结道:“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它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全新的行为和经验的社会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被创造出来——在个人和更为集体的层面上,这是一项充满困难的事业,但它也可能带来极大的回报。从权威方面看,这种社会是无中心的,但因为聚焦于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在机遇和困境方面却又是为中心的。认为自恋甚至个人主义在后传统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看法是错误的——从它所蕴含的未来的潜力方面说确实如此。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向对方敞开心怀是社会团结的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伸出‘友谊之手’从伦理角度来看是隐含在(新时代的)各项新议程之中的。”^①“后传统社会”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社会,但只要我们去把握住机遇,那么,作为人类整体,我们就并不会被禁锢在韦伯所设想的(现代性的)“铁笼”中,也非注定要遭受(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种)无可挽救的零散化、碎片化。在强迫性之外仍然存在着发展出各种与传统的程式真理无关的可靠的人类生活形式的机会。

三、拉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反思性及其幽灵:结构、美学、社群》(“*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一文则集中体现了斯科特·拉什关于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的有关论述。和吉登斯一样,拉什基本上也是在“反思性”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 reflexive 一词的。因

^① Anthony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p. 106—107.



此,正如贝克所明确指出过的那样,拉什所说的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指的也是“反思性现代性”。不过,拉什主张:第一,要把“反思性现代性”理论当作一种批判理论来看待和加以发展。他认为,在当前以及未来 21 世纪的社会变迁情境当中,只有“反思性现代化”理论才能充分发挥一种批判理论的作用。第二,要对“反思性现代性”中“反思”一词的含义做多方面的理解,而不能只把它理解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现状和前景作出恰当的描述、批判和把握。

拉什认为把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有两个优点:

首先,这种理论创造性地背离了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似乎永无休止的争论。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因其预设了一种有关社会变迁的乌托邦式的‘元叙事’而受到批评。对此,福柯一类的后现代分析家提出了与此相反的、似乎是反乌托邦式的进化论。反思性现代性的思想则似乎开辟了第三个空间——一个完全不同、结局更加开放的情景。”^①拉什认为反思性现代性的思想可以对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来得到更好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理性或现代化开始时“本来是具有解放性的,为自由表达、萌芽中的民主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开拓了可能性,然后却转而攻击其自身。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里,当市场交换开启的公共领域变成了与其对立的具有科层结构的垄断资本主义公司;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个人主义变成了法律理性官僚体制的机械性非人格;美学现代主义先锋的创造性动力变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牢狱塔楼和住房工程;当经典物理学反教权的解放潜能变成了 20 世纪后期破坏自然的科学时,启蒙或现代化也就变成了其自身挥之不去的幽灵。”^②按照这种思路,在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系统似乎无情地向前破坏着“生活世界”。然而反思性现代化却为现代化的转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12.

② Ibid.



性。当“现代化了解了其自身的无节制及其(对内部、外部和社会本性)之毁灭性征服的恶性循环后开始把其自身当作反思对象时”^①,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到“反思性现代化”阶段时,现代化将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这确实是反思性现代化与‘简单’现代化的区别之处。如果说简单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纵向和横向整合起来的、功能分化的中层经济公司,那么对后者的规则和资源所做的新反思则产生了灵活分解成的小型、相对自主的知识密集型公司的网络化区域。如果说简单现代化对启蒙事业之社会权利的本末倒置表现在官僚化福利国家的非人格性,那么反思性现代化则把福利服务理解为是一种以受助人为中心的合作生产,并提倡一种去中心化的、授权于公民的另一套替代性福利计划。如果说简单现代性的政治一方面服务于东欧过去抽象的‘蓝图式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服务于由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体制和抽象的程序化议会制结合而成的西方综合体,那么反思性现代性则提供一种置根于新社会运动的地方主义和后物质利益之中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的政治。简言之,如果简单现代化意味着征服,那么反思性现代化则意味着把权利授予主体。如果简单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福柯式的原子化、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情景,那么反思性现代化则展开了真正的个性化,为相对于我们的自然、社会和心智环境的自主的主体性开启了积极的可能性。”^②

其次,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的另一个优点是: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高度抽象的形式不同,它可以直接用于社会分析,从而构成了向时间诊断社会学的转变。拉什认为,“既有广泛的价值又有直接的实用性正是贝克和吉登斯二人的反思性现代性理论的长处……贝克《风险社会》一书的影响是社会理论终于回归大地的完美典范。这无论是从其概念还是表述的易理解性方面来说都是事实:《风险社会》和《爱之常态混沌》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最畅销的两本社会科学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12.

② Ibid., p. 113.



学著作,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外行读者中也广为流传。”^①吉登斯的著作也开始受到从专家到普通民众的普遍欢迎。拉什高兴地说:看到社会学的著作现在能够以如此广泛的政治支点和强大的分析能力处理当代的重大问题,“确实令人欣慰”。

然而,拉什指出,如果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仅仅停留在贝克和吉登斯所阐发的那些内容和形式上,那是远远不能承担起作为一种面向21世纪的批判理论的重任的。要能够承担起这样一种重任,就必须对现有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自身进行重要的反思、补充和发展。“只有对它进行一种与其现有的成果根本相反的把握,才能使这个反思性现代性理论获得这样一种批判能力。也即是说,只有基本上按照其自身尚未明确表达的他者来理解,从与它自身明确陈述的目标相反的角度并在它自身未言明的那些假设的情景下来阅读时,这个反思性现代性理论才能够最好地发挥批判的功能。”^②

拉什从三个方面来对现有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补充和发展。

第一,拉什认为,现有的反思性现代化是一种关于社会行动者的权力日益增长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必须以一种新的“结构理论”加以补充。

拉什认为反思性现代化的核心假设是行动者或能动作用不断从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是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者的结果。“可以说实际上是结构迫使能动作用解脱出来,因为只有在能动作用能够将自己从受规则约束的‘福特式’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前提下,结构性的资本积累才有可能。”^③这一过程通常被人们从“弹性专业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弹性专业化过程中,日益专门化的消费要求有更加灵活的生产方法。在这种情景中,专门化的消费一方面鼓励公司小批量生产某种特定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18.

② Ibid., p. 110.

③ Ibid., p. 119.



的商品,另一方面鼓励公司扩大所供商品的种类。为了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公司及其工人必须更快地创新,而这种速度越来越快的创新绝不仅仅是‘灵活性’的问题。更快的创新要求把更多的工作量相应地放在新产品的设计上。它要求知识密集型的‘设计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占有更大的比例,而物质的‘劳动过程’只能占很小的比例。知识密集必然包含着反思性。它以自我反思性为条件,因为规则对工人的外在监控为工人的自我监控所取代。它包含(和要求)一种‘结构性反思性’,因为生产场所的规则和资源(后者包括生产手段)不再控制工人而是成了能动作用的反思对象。也即是说,能动的主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对这些规则和资源重新进行改组和利用,以达到不断创新的目的。”^①

然而,“行动者或能动作用被从结构中解脱出来”的论题并不意味着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中行动者或能动作用完全不需要任何“结构”条件和不再受到任何“结构”的制约了。事实上,“反思性现代化”的“解脱”作用只是意味着行动者或能动作用从以往那种传统的(“福特式”的)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而非进入一种完全“无结构”的状态。“反思性(现代化)有一套新的结构条件。”“尽管社会结构确实有所倒退,允许能动作用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但这种‘自由的’、可感知的能动作用拥有新的结构条件。”^②

那么,这种新的结构条件是什么呢?拉什指出,这种新的“结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也不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结构),而是连成一张网的全球和地方的信息、沟通结构网络。“退缩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信息和沟通结构所替代。”^③在反思性现代化中,行动者能动作用的发挥也仍然需要以这种新的“信息和沟通结构”为条件。行动者能否成功地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依然取决于他在这种新的“结构”中的位置。“在工业资本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19.

② Ibid., p. 111.

③ Ibid.



主义中,‘生活机遇’和阶级不平等取决于行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和对生产方式的掌握。在反思性现代性中,生活机遇——谁将成为反思性胜利者及谁将成为反思性失败者——取决于在‘信息模式’中的位置。反思性现代性中的生活机遇并不是掌握生产性资本或生产结构的问题而是能否掌握新的信息和交流结构并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的问题。”^①因此,在反思性现代性中,社会成员将会发生新的分化。伴随着新的反思性生产过程的需要,工人阶级中的部分成员经过培训、学习等途径将会得到改进而转变为“新的反思性工人阶级”。因为“信息的流动和获取是反思性生产的结构性条件。此中的先决条件是培训和信息流的获取,而这就意味着对相对于经典的、福特式的无产者而言的新‘反思性’工人阶级进行一次改进。那些信息结构是当代简单工人阶级的一个生存条件,因为在没有那些结构条件的地方,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工人阶级的工作也消失了。”^②随着信息商品生产成为资本积累新的轴心原则,在反思性现代性中还产生了新的中产阶级。“他们主要以专家系统内的专家的身份工作,在信息和沟通结构中,他们自身便是处于各种不同位置上的积累起来的信息和信息处理能力储存中的‘节点’。”^③与简单现代性中以服务业为主的中产阶级不同,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已不再是“服务阶级”,倒更像是“被服务阶级”。此外,“在反思性现代性中还有第三阶级,这个阶级从根本上排除在信息和沟通结构之外。”^④他们包括沦落下来的工人阶级、外来移民和系统性地被排除在信息和沟通结构之外的妇女,属于反思性现代性中的“底层阶级”。可见,反思性现代性并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福音。而只有看到反思性现代性所具有的、与以往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新的结构条件,才有可能对新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做出真正富有批判性的反思。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121.

② Ibid., p.127.

③ Ibid., p.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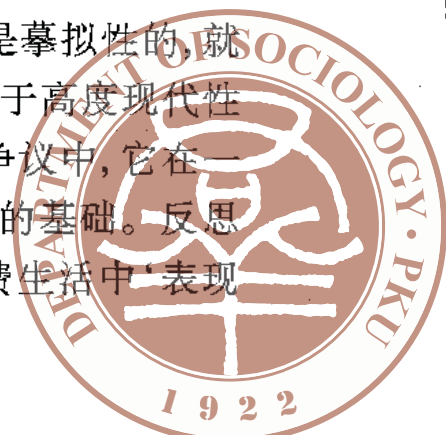
④ Ibid., p.130.



第二,所谓“反思性现代化”中的“反思性”,在含义上不仅包括了认知的维度而且也包括审美维度。

拉什认为,贝克和吉登斯所表述的“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中的“反思性”本质上只是一种“认知的反思性”。这种“认知的反思性”源自于从康德经迪尔凯姆到哈贝马斯的启蒙传统,它预设着一种由普遍对特殊的批评。然而,拉什指出,单纯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反思性”及“反思性现代化”的含义是极其片面的,它将使我们不能全面地把握“反思性现代化”的内容和现状。拉什认为,除了“认知”的角度之外,现代性实际过程中的“反思性”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或类型,这就是美学角度的“反思性”。这种美学角度的“反思性”存在于从波德莱尔开始经由本杰明再到阿多诺的传统之中。在这个传统中受批评的对象是高度现代性的整体、是高度现代性的普遍概念。

关于“反思性现代性”的上述两个维度,拉什写道:“不仅知识在信息和沟通结构中流动,不仅概念符号在现代性中作为反思性的结构性条件起作用,空间中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也是如此。这另一种符号系统不是概念性的而是摹拟性的。在晚期现代性中,这种符号系统为美学反思性而不是认知反思性提供了可能性。概念性符号,即信息和沟通结构中的信息流。它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它们为资本家的统治呈现了一个新的论坛。在这里,权力已经不再是存在于作为生产之物质手段的资本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模式的权力/知识综合体——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与跨国公司相联系。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些概念符号的流动和积累又构成了反思性的条件。构成我们符号系统另一面的图像、声音和叙事等‘摹拟’符号也是如此。一方面,作为文化产业之商品化的知识财产,它们属于典型的后工业的权力集合体。另一方面,它们又为这同一个权力/知识综合体的美学批评之大众化打开了虚拟的和真实的空间。反思性的这个第二种美学的而非认知的要素从本质上说基本是摹拟性的,就此而言,它是处于艺术的现代主义传统之中而不是处于高度现代性的启蒙传统之中。在族群化情境和‘新部落主义’的争议中,它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情境性、偶然性的伦理观的基础。反思性的这种美学维度最终构成了当前资本主义日常消费生活中‘表现



个人主义’的基础性原则。”^①

在《专家系统还是情境解释？去组织化资本主义中的文化和制度》这篇回应性文章中，拉什更具体地解释了美学反思性的概念。拉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范式不是一种而是两种，其一是从科学假设出发，形成了一个包括伽利略、霍布斯、笛卡儿、洛克、启蒙运动、(成熟的)马克思、科布塞尔、社会学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哈贝马斯等在内的发展谱系。另一种现代性则是美学的，除了在巴洛克艺术和某些荷兰风景画中曾有过短暂的显露之外，它主要作为对前一种现代性的批评而生机勃勃地出现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美学现代主义中。如果我们拟从科学社会学家(及某种程度上从本书中贝克的)的角度出发把反思性理解为一种范式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19世纪晚期文学和艺术的现代主义则是现代性真正具有反思性的首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后传统社会之前，反思性现代性的第一个实例是通过美学出现的。第二种现代性是通过第一种现代性的反思并且是作为对后者的反射作用而产生的，其世系包括了浪漫主义运动、青年黑格尔、波德莱尔、尼采、齐美尔、超现实主义、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舒茨、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以及(当代社会学中的)鲍曼。”^②

拉什认为，关于“反思性现代化”的研究就是要讨论人们的“感受力(包括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是如何从传统的结构和制度中分离出来。在这个分离过程中，这种感受力(包括分析性的和诠释性的两种在内)将其批判的眼光和能力转向高度现代性自身的符号产品，从而具有了反思性。因此，这种或者是从分析的立场出发、或者是从一种更为富于情感性和诠释性的立场出发对专家系统、对启蒙秩序及其假设所展开的批判并不仅仅表明当今现代性中的普通大众也正在日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35.

^② Scott Lash, *Expert-systems or Situated Interpretatio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212.



益具有反思性,而且也意味着现代性在自我批判中将自身带上了审判台。如果说分析性的、科学性的世界观向普通大众群体的这种广泛渗透即是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的话,那么美学现代主义的感受力向同一个大众群体的广泛渗透(正像无数的评论家都曾描述过的那样)则是其他许多人所欲理解的后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既是后者的问题也是前者的问题。贝克和吉登斯二人都对简单现代性、对启蒙事业有关元叙事秩序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对他们来说,反思性现代性是以‘矛盾情感’或‘实验’为特征的。然而,他们的矛盾情感概念和实验概念主要是来自关于不确定性的科学观念以及关于科学干预造成意外后果的想法。这是不充分的。我期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感受力将更多地来自于美学感受力或诠释感受力。”^①

拉什指出,对“反思性”概念含义的片面理解使得贝克和吉登斯将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制度反思性和专家系统的作用等问题上,而对于社会日益具有的“文化”性质和日常生活及普通大众的作用则关注较少。这使得他们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一个好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必须将美学的“反思性”考察在内,这样才能够对社会现实作出更全面的批判性反思。拉什关于两种现代性的思想,在他后来的一部著作《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的理性》^②当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和发挥。

第三,拉什认为,现有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个体化的“强纲领”,对于这种理论纲领也必须补之以一种有关“社群”的新理论。

拉什指出,由于美学现代性是要用个人的感性体验来批判和解构抽象的概念,用特殊的细节来批判和解构普遍的原则,用差异来对抗同一和整体,它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激进的美学个人主义观念的

^① Scott Lash, Expert-systems or Situated Interpretatio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p.212—213.

^② Scott Lash,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UK: Blackwell, 1999.



泛滥。这种激进的美学个人主义有可能导致一种“特殊主义的危险”存在。从而导致人类社群的彻底瓦解。为了避免这种情景的出现，鲍曼提出了一种对他人的“理解伦理(ethics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other)”，罗蒂则提出了一种“言语社群之间的‘世界主义的’翻译语用学”，试图以此来理解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些论点，人们起初觉得很满意，但不久便感到不安。“人们可能会问，在‘同一’之间尚未建立起一种确实可信的共享意义感之前，鲍曼和罗蒂凭借什么如此急切地谈论向他者的转译呢？或许这些‘新部落’很可能像安德森的‘想像社群’那样根本不是部落或社群而只不过是原子化的个人的联合？”^①拉什认为，“在这些分析中极度缺乏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令人信服的‘社群’概念，缺乏‘我们’的概念……处于讽喻传统中的分析家们，从尼采到本雅明和阿多诺，直至德里达、罗蒂和鲍曼，都以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为前提——当然不是一种功利性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美学上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一种控制着自我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充斥着异质的、偶然欲望的个人主义。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几乎不可能导致社群的形成。”^②拉什说，他坚信，“在美学反思性的星空下，在这种对概念的摹拟批评的星空下，对‘我们’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可能的。若想接近社群就必须与这种抽象的美学主观性决裂，可能还必须拒绝由解构所建议的‘方法’而转向由诠释学所倡导的‘真理’……若想接近‘我们’、接近社群，我们就必须进行诠释性理解而不是进行解构，并因此而回避能动性、结构与主体与客体之类的范畴，避免控制与偶然性的对立和概念与摹拟的对立。在风俗中、在习惯中、在认知个人主义和美学个人主义的背景实践中，这种理解将带来走向本体论基础的通道，同时它还会使我们对社群的共享意义有一定的了解。”^③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p. 143—144.

② Ibid., p. 144.

③ Ibid.



拉什认为,美学反思性一直都是反基础主义的,布希亚、拉康、德勒兹、德里达等人都在不断地对作为社群存在之条件的各种“基础”进行解构。这种无穷无尽的“解构”“无一能够导致对‘我们’的任何把握,而只能导致基础越来越薄弱的、形式上越来越趋向于浮士德式的美学的‘我’。”^①为了把握住“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为上述思想家们所使用的那种“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而是一种“拯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retrieval)”。 “与怀疑大师们不同,这种拯救诠释学不会永无休止地扫除一切根基而会试图揭示共同在世的本体性基础……拯救诠释学不会以浮士德式的怀疑不断地寻找‘超验的所指’,也不会长期延迟和否认意义。它不会在能指的自由嬉戏中惊奇不已,而是谦虚地在这个能指之下寻找,以获得通向共享意义的道路;这种共享意义是存在的条件,实际上也正是‘我们’的存在。”^②

在对“社群”概念所做的进一步讨论中,拉什从康德、马克思、利奥塔、马费索利、伊格尔顿、鲍曼、罗蒂、阿多诺、尼采、鲍德里亚、德勒兹、拉康、德里达、伊拉盖里、黑布迪格、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泰勒、布迪厄、列维-斯特劳斯、马尔库塞等理论家的论述出发,揭示了社群概念的基本要素。那就是,“社群必须在根本意义上处于一个‘世界’中。”“社群”是与其成员共同享有某种本已存在的意义和习俗性知识为基础的。“社群并不包含对能指的经常质疑;相反,它扎根于共享意义和仪式化的背景习俗之中。这里的共享习俗具有内在的、具有导向作用的‘终极目的’……指导这些实践是由图式、由风俗而不是由规则所指引……当人们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时即被投入到意义和习俗的世界之中,这时实质性的利益已经存在于这个意义和习俗的世界之中。包容了实质性利益的意义和习俗是后天习得的,但随即变成了似乎是铭刻在身体之上的无意识。”^③社群与共享利益无关,

① Scott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145.

② Ibid., p. 146.

③ Ibid., p. 157.



具有共同利益的政治党派和社会阶级并不是社群而只是利益群体；社群与共享属性无关，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可能共享某些属性或特点，但相互之间则可能是彻底分裂的。只有形成这样一种“社群”的概念，我们才能够对反思性现代性时期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观照，更好地把握住反思性现代化的方向，并在新的情境下寻找和重建一种将“自我”和“我们”协调起来的“反思性社群”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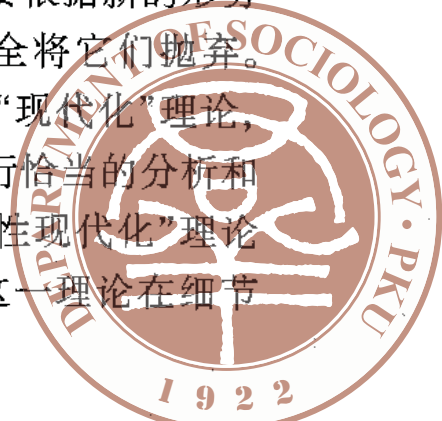
四、结 语

尽管在 reflexive 一词含义的理解上以及对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之内涵的阐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无论是贝克、吉登斯还是拉什都把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和所谓“后现代性”社会理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还是后来兴起的所谓“后现代性理论”都不能够被用来帮助我们适当地描述和理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过程。一方面，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过分强调当前的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与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拘泥于在传统的工业社会时代所形成的那一套词汇和命题，从而无法对当前正在变化的社会过程进行适当的理解和概括。按照贝克的说法，传统的社会理论，无论是认为现代化将引导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乐观宿命论”还是认为现代化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的“悲观宿命论”“在一个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现代性只有一种形式，即工业社会，其强迫性一度产生消费社会和民主的混合体，然后便加速了总体衰落。不存在第三条途径。”^①这样，便使我们无法对“如果不可避免的事果然成真，即现代化甚至超越了工业社会的限度，那么现代性将呈现怎样的面目”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探寻，从而阻碍了我们对现代性的新形式、新途径、新阶段进行恰当的讨

^① Ulrich Beck,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e: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 p. 24.



论。另一方面,新兴起的所谓“后现代性理论”则完全割断了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发展过程与以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认为西方社会当前所发生的变迁过程是一个巨大的断裂过程,它正在将西方社会引入一个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形式,它完全不能再用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词汇和命题来加以说明和解释,而必须要用一套全新的概念和命题来对之进行理论化。这种理论虽然突出了当前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实与以往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差别,但却完全抹杀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没有意识到当前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各种内在趋势或特点的激进化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以此为借口完全抹杀现代性的价值与合理性。正如吉登斯和拉什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理论实际上也没有能够对当前的西方社会过程和社会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论描述和解释。贝克、吉登斯和拉什都认为,与上述两种理论立场都不同,“自反性”或“反思性现代化”的理论概念为讨论当前西方社会的变革过程开辟了“第三个空间”。它既不否认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不否认这些巨大变革正在把西方社会引向一个与以往的现代化社会很不相同的“新”社会形式或阶段,不否认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在帮助我们描述和理解这些新形式或新阶段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但和所谓的“后现代性理论”不同,它又不否认当前的社会过程及社会现实与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或逻辑上的一致性、连续性,不认为当前西方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实与以往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断裂,而是明确地认为当前的西方社会从根本上说依然处在“现代性”的逻辑范畴之内,只不过是这种逻辑极度作用(激进化)的一个结果而已。因此,我们既要意识到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又要意识到这个新时代从根本上说目前也还没有完全超出“现代性”的逻辑范畴。我们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对传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进行修正,但又不能完全将它们抛弃。“自反性”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运用它我们就有可能对当前的西方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恰当的分析 and 讨论。贝克、吉登斯和拉什对这种“自反性”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的效力和前景似乎都充满了信心。而事实上,不管这一理论在细节



上目前是多么不完善,它确实是为我们理解当前的西方社会变迁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变迁都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新的思考方向。我们应该对它认真地加以关注、了解和思考。

